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东方考古

第8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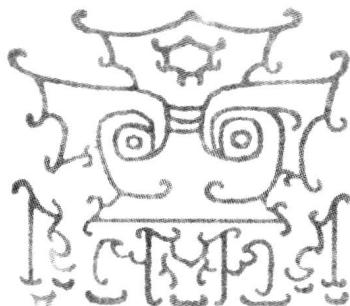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山东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东方考古

第 8 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考古学和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系列丛书，分集陆续出版。本系列丛书以中国东方地区和东亚地区考古学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它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考古学和东方文明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8集收录34篇研究论文和2篇发掘报告。内容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环境变迁、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及动植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及史学研究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考古·第8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3-033891-4

I. ①东… II. ①山 … III. ①考古学 - 研究 - 亚洲 - 文集 IV. ①K8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867 号

责任编辑：刘能 / 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陈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9 插页：4

字数：673 000

定价：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东方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来丰实

副主任 方 辉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广 王 青 方 辉 白云翔

任相宏 佟佩华 陈淑卿 赵 辉

来丰实 崔大庸 靳桂云

秘书 陈淑卿

序

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自 20 世纪初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 80 多个年头。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 20 世纪结束之前，基本建立起中国主要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时空框架。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正处于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考古学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考古学呼唤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渴望能够提供更多信息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诉求在世界考古学的平台上来进行中国考古学研究。于是，各种理论和方法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从调查、勘探、发掘到分析、整理和研究的考古学全过程，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结合日趋紧密，这些已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显著特点。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推动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与国内外考古学者的联系和合作，并体现今后的研究重点和优势，山东大学于 2002 年春正式组建了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心下设史前考古、历史考古和环境考古三个研究室，建立了以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为主的环境考古实验室。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将最大限度地运用山东大学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在学校的支持下，整合各种可利用资源，切实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所谓东方，其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中国的东方。以海岱、燕辽、太湖地区为主导并包括东北北部和闽台在内的东方地区，不仅地域上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所以，究明这些地区古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中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和融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任务和长远目标。二是指世界的东方。不仅包括中国，在分布地域上也涵盖了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与中国内地地域相连，文化上的联系源远流长，在人类的产生和迁徙、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等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和进步方面，相互之间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开展并深化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今后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学术文集，也是有志于东方考古研究的学者们开展学术交流的园地，我们热忱欢迎来自海内外的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东方考古》的成长过程中，期盼着学界同仁的关心、呵护和扶持，以为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尽到绵薄之力。

栾丰实

目 录

序	栾丰实 (i)
世界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中国文化旅游	沈 辰 (1)
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伦理学	菲莉丝·M·梅辛杰 (8)
文化遗产价值在个人、团体和国家保护与管理历史中的作用	乔治·S·史密斯 (17)
法律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管理中（不）相融的对话者	
——作为文化遗产管理工具的法律普适性评估	希拉里·A·索德兰 (24)
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进程	阿琳·K·弗莱明 (29)
先祖遗骸的遗产价值与管理——以中美两国为例	余琳 (35)
台湾原住民文化遗产的复兴	黄惠璣 (44)
澳门的文化遗产价值管理	希拉里·杜·克劳斯 (53)
中国人在行动——中国大遗址保护五年回顾	杜金鹏 (57)
现在的过去还是将来的过去——中国旧石器遗址现状与保护对策	陈胜前 (69)
谈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于海广 (79)
山东莱州湾南岸盐业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王 青 (85)
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崔玉范 (93)
《洛桑宪章》对考古遗产保护规划的启示——以曲阜鲁国故城为例	
.....赵 云 张 谨 (102)	
青莲岗文化的回顾与反思——兼论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文化区的相互关系	
.....张 敏 (110)	
河姆渡文化的冠冕及鸟鱼纹饰	宋 建 (137)
尧王城考古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栾丰实 (147)
“夏”字形探源	李维明 (153)
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聚落形态分析	宋爱平 (156)
大连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格局形成的动因	张翠敏 (195)
考古新得齐陶三则跋	孙敬明 (211)
寿光北部盐业遗址发现齐陶文及其意义	刘海宇 (219)
战国两汉铜镜图像解读	张从军 (225)
再论滨州大学博物馆所藏三身造像的来源	唐仲明 (248)
宋代铜镜分期初探	陈章龙 (254)
金上京城址出土的铜鱼和铜鹿角的用途	Э·B·沙弗库诺夫 著 孙 危 译 (302)
先秦时期山东地区与东北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对比研究	赵永生 (309)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哺乳动物遗存分析	宋艳波 王 青	(318)
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月庄等遗址为例	吴文婉 杨晓燕 靳桂云	(330)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文化遗址——沉积物的土壤微形态学研究	靳桂云 郭正堂	(349)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文化遗址植硅体研究	靳桂云 吕厚远	(353)
山东省临沭县东盘遗址 2009 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王海玉 刘延常 靳桂云	(357)
遗址开发域和地形的关系——来自西班牙的两个旧石器时代研究案例	G N Bailey I Davidson 著 冉炜煜 译 王 青 校	(373)
瓦哈卡及特华坎谷地的遗址资源域分析	Kent V Flannery 著 付永敢 译 王 青 校	(395)
四川汉源龙王庙遗址 2009 年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雅安市文物管理所 汉源县文物管理所	(406)
济南市奥体中路画像石墓简报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443)

CONTENTS

Preface	Luan Fengshi (i)
Evaluating Values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China	Shen Chen (6)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Archaeological Ethics	Phyllis M Messenger (16)
The Role of Heritage Values in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the Past for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George S Smith (23)
Law as (In) Compatible Interlocutor in Sustainable Heritage Governance: Appraising Jurisprudential Universality as a Heritage Management Tool	Hilary A Soderland (28)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rlene K Fleming (33)
Heritage and Stewardship of Ancestral Remains: America and China	Yu Peilin (42)
The Revival of Taiwan's 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	Huang Huiji (52)
Macau's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Hilary Louise Du Cros (56)
Review on Preservation of Large Heritage Sit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Du Jinpeng (68)
The Past for the Present or the Future: The Current Questions and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Paleolithic Sites	Chen Shengqian (77)
Thoughts on Some Key Issues o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Yu Haiguang (83)
Protection of the Salt-industry Heritage in Laizhou Bay, North Shandong, China	Wang Qing (9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Heritage in China	Cui Yufan (101)
Inspirations from Lausanne Charter to Planning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Protection: Site of Capital of Kingdom Lu, Qufu	Zhao Yun Zhang Jin (109)
Review and Introspection on Qingliangang Culture	Zhang Min (136)
On Crown and Bird-Fish Patterns	Song Jian (146)
Main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ces of Yaowangcheng Site	Luan Fengshi (152)
Origin of the Font of Xia (夏)	Li Weiming (155)
Analysi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from Prehistory to Shang and Zhou Period in Zhengzhou Area	Song Aiping (194)
Causes of Formation of Early Bronze Cultural Pattern in Dalian Area	

.....	Zhang Cuimin (210)
On Three New Found Inscriptions on Pottery of Qi State	Sun Jingming (218)
The Pottery Inscriptions of Qi State Discovered in Salt Industry Remains of North Shouguang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iu Haiyu (224)
Interpreting Images on the Bronze Mirrors of Warring States-Han Dynasties Zhang Congjun (247)
Re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Statues in the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ang Zhongming (253)
The Study of Song Bronze Mirrors by Staging	Chen Zhanglong (301)
The Use of Bronze Fish and Bronze Antlers Excavated from Shang Jing Capital of the Jin Dynasty	Э В Шавкунов Translated by Sun Wei (308)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and the Northeastern before Qin Dynasty	Zhao Yongsheng (317)
The Mammal Remains Analysis of Xijincheng Site, Boai County, Henan Province Song Yanbo Wang Qing (329)
The Application of Starch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Case Studies on Yuezhuang and Other Sites	Wu Wenwan Yang Xiaoyan Jin Guiyun (348)
Soilmicromorphology Study of the Sediment from the Palaeolithic Site at Wangfujing, Beijing	Jin Guiyun Guo Zhengtang (352)
Phytolith Analysis of the Sediment from the Palaeolithic Site at Wangfujing, Beijing Jin Guiyun Lv Houyuan (356)
Analysis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ongpan Site, 2009, Linshu County, Shandong	Wang Haiyu Liu Yanchang Jin Guiyun (372)
Site Exploitation Territories and Topography : Two Case Studies from Palaeolithic Spain	... G N Bailey I Davidson Translated by Ran Weiyu Proofread by Wang Qing (394)
Empirical Determination of Site Catchments in Oaxaca and Tehuacán Kent V Flannery Translated by Fu Yonggan Proofread by Wang Qing (405)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2009 Longwangmiao Site, Hanyuan County, Sichuan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Management S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Ya'an City (442)	Management S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Hanyuan County
A Briefing of Portrait Tomb on Olympic Road, Jinan Jin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454)

世界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中国文化旅游

沈辰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加拿大)

一、导论

近年来, 国际游客被中国各项自然和文化遗产深深吸引。根据中国旅游最具权威机构——中国国家旅游局 (CNTA) 统计显示, 仅 2006 年, 到中国观光的国际游客以及港澳台游客达到 222 万人次, 较上年同比增长 9.65%。2006 年国外游客带来 339 亿美元收入, 国内游客也带来 6229 亿人民币元 (折合 850 亿美元) 收入。无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组织都意识到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的推动力在于知名的历史遗迹和纪念性建筑, 其中特别是世界遗产遗址 (WHS)。

文化旅游主要是针对参观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如中国、埃及、印度和墨西哥以及其他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的国家等开展与旅游相关的文化活动。但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 直到最近才成为学者研究的领域 (Singh, 1994; Smith, 2003; Mckercher and Du Cros, 2002 等)。在中国, 文化旅游为遗产管理的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 特别是如何制定长期性保护规划的文化遗址应对文化旅游不断增长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新问题。在现有条件下, 中国的文化遗产管理 (CHM) 专家和旅游业者似乎已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解决办法, 至少暂时可以解决问题, 即通过申请世界遗产作为遗址保护和增加旅游目的地的手段。自 2004 年, 随着教科文组织 (UNESCO) 第 28 次世纪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 中国也参与到世界遗产掀起的持续热潮中。世界遗产热潮的背后, 是评估和重新评估文化遗产价值的过程, 公众借此机会可以检验自己是否低估了自身文化遗产的价值, 并思考如何发挥出文化遗产的价值。

由于曾不止一次作为专家参与以中国为目的地的文化旅游团队, 作者注意到文化旅游都不可避免地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最终目的并大力度予以宣传。鉴于多年来曾不止一次到访同一文化遗址, 我观察到许多中国的世界遗产发生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和民众已经认识和重新评估文化遗产价值, 并将推动文化旅游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指出《世界遗产名录》所收录的遗址, 必须满足“突出的普遍价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UNESCO, 1992)。尽管世界遗产“普遍价值”的定义至今仍然在热烈讨论中, 但十个标准已经达成共识, 其中包括文化价值、人文传统和社会/历史意义等世界遗产评选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上述标准并不包括遗址的公共价值。但现实世界中, 公众是通过自身利益来衡量

文化价值的（Clark, 2006）。许多地方的民众（包括游客、当地人、政府和私人机构）通过投资（保护）和收益（旅游业收入）等数字比较来衡量遗产价值（Throsby, 2006）。因此，我在本文中将考察如何评估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将其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中。换句话说，本文将考察旅游业发展中如何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并阐述原因及其后果等。

二、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

中国政府于1982年正式承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大会公约》。到2009年10月，36个中国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25个文化遗产，7个自然遗产和4个自然文化遗产，遗址数量居全球第3位（UNESCO, 2009）。第一批6个遗址于1987年获提名，包括重要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和纪念物等，如紫禁城、秦始皇陵、莫高窟、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长城等。这些遗址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同埃及金字塔或者希腊的阿波罗·伊壁鸠鲁神庙一样，从方方面面显示出“突出普遍价值”。起初，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专业人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动机，在于将其作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交流遗址保护经验的机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学者们愈发意识到中国缺乏有效的方式，保护面临自然侵袭和人为破坏的遗址。正是国际社会的参与，类似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较早列入世界遗产的遗址才能得到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另外，通过与教科文组织专家的合作，中国政府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并对敦煌莫高窟和1996年成为世界遗产的乐山大佛等遗址开展了保护工作。

截止到1997年，中国只有16个世界遗产。大部分遗址已经为全世界所熟知，并成为大部分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每个国家都为世界遗产的头衔感到骄傲。那时，公众认可了这些遗址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视觉感受、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等，并给予其较高的评价。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那时世界遗产的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与财政收入相联系。相反，由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中国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荣誉明显是与遗址的保护和修复利益相关的。因此，最初十年间，中国为得到世界遗产提名的动机仅仅是出于保护和重新认识文化遗产价值为目的的。

三、世界遗产的经济价值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世界遗产的公共价值自1997年开始发生改变。1997年，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成为世界遗产。这两个地方原本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然而，随着它们成为世界遗产，世界各国的游客纷至沓来，涌入党本宁静的小镇，当地的民众也迅速地把握住了其中的经济利益。

平遥位于山西省中部地区，2002年时人口不超过50万。在中国，如此规模是典型的小型城市，即县级城市。古城具有2700多年的历史，保存有完好的古代城市功能布局和传统建筑，这些代表着“突出普遍价值”。在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数量在第二

年增加了300%。古城两个主要景点（双林寺和镇国寺）的门票收入从1996年度18万人民币（折合3万美元）激增到780万人民币（折合130万美元）。13条公交线路出现在了原本没有公共交通系统的小镇。停靠平遥站的火车由一天13趟增加到了26趟，增加了1倍。平遥镇在没有成为著名旅游目的地之前年财政收入是4000万人民币（折合700万美元），到2000年已经达到了11000万人民币（折合1600万美元）（Yan, 2004）。

云南省的丽江古城，一个过去几乎没人知晓的小镇，成为了国际游客眼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云南省政府每年向丽江政府财政拨款200万。小镇旅游收入确能达到13400万人民币（折合2200万美元），约占全镇年度GDP的一半以上。文人墨客眼中“中国最美的山”——黄山，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其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数量由每年几百万激增到一年2个亿（Yan, 2004）。

无一例外，所有世界遗产的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利益都呈现上升态势。在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很明显得与经济数据连关联，造成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中出现了经济价值，逐渐偏离了纯粹的文化价值。世界遗产的提名过程在其最初的十年，更多的是由中央政府中的文化遗产管理的专家和遗产管理人员参与，而现在多为地方政府参与其中。除了2002年，中国在1997年之后每年都有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仍有数十个申请已经通过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初审并进入筹备状态，等待世界遗产大会的逐年审核。申请热潮的背后明显与文化旅游密不可分，这里既有好的动机也有不良的缘由，并最终导致各种可能性出现，为遗产管理的专业人员带来了挑战。

四、动机和结果

截止到2006年，主管文化遗产管理的机构——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涵盖了2351个考古遗址和历史遗迹。不论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还是社会影响的方面，这名单中任何一个遗址都有资格成为世界遗产。实际上，目前38个成功申遗的遗址都在这批国家文物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1982年，为了防止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国家文物局定义了一批特殊文化遗址：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文化名城/文化名镇/文化名村。到2006年，国务院确认了96个历史文化名城，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这种文化遗产管理方式，是将现存遗产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将遗产附近的村落景观和城市开发范围考虑在内，进行全面的文化价值评估。如果希望这些遗址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由于文化旅游不断发展而自然出现的）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必然要求一个更加完善的管理方式，能将过去遗址评估中所忽略的环节涵盖在内。

地方政府看到文化遗产可以吸引游客观光并带来经济利益，着力开发先前被忽略的遗址的文化价值。官员们开始频频使用“文化管理”这个时髦的术语，以在其管辖区域现实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重新评估，并且愿意与文化遗产管理人员就遗址的保护和修复等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

文化遗产管理的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地方政府管理议题出发，从事申遗准备工作中

遗产的修复保护工作（Shi, 2002）。例如 1999 年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重庆市，在大足石刻遗址恢复了 10 万平方米的草坪。在丽江，地方官员叫停了大部分污染企业并投资 4 亿元人民币（折合 65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自然环境、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 2001 年 10 月，教科文亚洲委员会第 5 次年度会议在丽江召开，与会的国际专家了解当地发展情况，并对文化遗产管理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Mu, 2003）。

在新一轮申遗的竞争中，地方政府都将发展文化遗产作为优先考虑的议题。这些举措也不断促使当地民众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进行重新审视。现在的年轻人有着比父辈更丰富的资源去理解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在申遗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理解和见证中国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政府将每年 6 月的第 2 个星期六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日，反映出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视。2006 年第一个“遗产日”就是对中国的世界遗产关注的产物。

参与申遗的遗址价值评估对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Shen, 2008；Shen and Chen, 2010）。例如，曾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商朝的政治中心（殷墟），具有 3300 多年历史的安阳市，极有可能在南水北调输水线路施工中受到影响。通常文化遗产管理的主管人员在面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大工程，如三峡大坝工程等往往无能为力。但今时不同往日，殷墟是由安阳市和中央文化遗产管理专管部门提名，并于 2006 年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评选。安阳市政府成功说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改道以避免影响殷墟遗址。我们可以明显地意识到，安阳市政府成功利用世界遗产背后强大的政治力量。当然，殷墟也成为中国第 33 个世界遗产。

然而，地方政治和财政的介入，使得申遗的过程也要付出一定代价（或无法预期的结果）。地方政府需要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各项投入取得经济回报。一旦该地区成为世界遗产，遗产管理的议题迅速失去了原本在地方政治日程中具有的优先权。过去几年间，文化遗址的商业发展不受控制地迅猛发展，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位置迅速被旅游部门所取代（Wang, 2002）。例如湖北省武陵源遗址区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六年间，新增旅馆和酒店 400 多家，并修建了数百家的商店和其他服务设施。这些仅仅是在 39 平方千米的狭小的山地景区内修建的。人类活动带来的污染严重危害着这片自然遗产。1998 年教科文组织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并发表报告指出：“主管部门邀请了省级和中央政府的相关人员共同讨论遗址管理问题。考虑到遗址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世界遗产的主要价值之一，与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开展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主管部门希望能引起党委的重视，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发展旅游业。……主管部分建议将 IUCN 的报告递交给中国相关部门。”（UNESCO, 1998）

地方政府按照经济社会的日程进行文化遗产的管理，造成遗址周围环境的新一轮破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家乡出现了文化遗产损失问题可看做例证。山东省曲阜市是东周时期（前 771 ~ 前 221 年）鲁国的都城。目前，曲阜市 64 万人口中，大约 1/4 的人口是孔子第 73 ~ 78 代传人。在这个古老的城区中，一个始建于公元前 487 年的庙宇是用来纪念孔子的，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曾到此缅怀孔子。孔庙、孔府和孔林在 2500 多年来一直都受到

到保护，并于 1994 年成为世界遗产。

1999 年，当地政府将曲阜市旅游局作为三孔遗址的主管部门，以便通过文化旅游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旅游局与私人机构签约委托其开发三孔遗址。尽管当地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对商业决定进行批评，但这些商业决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不难想象这种完全出于商业考虑的决定，由于缺乏文化遗产管理的考虑最终导致许多珍贵文化遗迹遭到破坏。

2000 年，一辆获得在孔庙内营运资格的汽车撞上了一块元代（1270 ~ 1368 年）的石碑。该石碑由于其重要的铭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尽管得到修复，但石碑还是断裂为几块。另外，该公司还对三孔内 100 多处古代绘画木结构建筑物使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结果造成建筑物上悠久的彩绘和装饰大面积流失，遭到永久性破坏。

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国家文物局的调查人员对问题进行了更正并尽量控制破坏范围。此次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招致大范围的社会批评。国家文物局借此机会给民众敲响警钟，并批评那些忽视文化遗产管理的部门。

相关部门由于政策制定中过多考虑发展旅游业是一种错误行为。中国到 2006 年仍然没有法律法规来规范世界遗产的管理问题。长城是中国第一世界遗产，但直到 2006 年 12 月 1 日中国国务院才颁布《长城保护条例》（国务院第 476 号），这距长城成为世界遗产已经 19 年。该条例是第一部规范地方政府进行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的条例，并明确了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发现遗产管理的问题，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时，如何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包括旅游局等部门开展合作的各项机制。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另一个重要的文件——《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中国目前数十个世界遗产及其他许多有意申请世界遗产的遗址的管理提供了准则。上述准则和法规制定得有些迟，但总好过没有任何法规。它们的制定显示出中国遗产的管理者和专家已经汲取教训，并开始弥补一些薄弱环节。

五、遗产价值评估与文化旅游

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遗产的管理与文化旅游的关系”问题是很多文化遗产管理专家和旅游业者中富有挑战性的问题（Thapa, 2003、2009；Leask and Fyall, 2006；Pomeroy, 2005）。对于一个拥有将近 40 个世界遗产的国家来说，中国对此类问题的案例研究还不充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我们可以认识到申请世界遗产时复杂的动机和结果，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改善了世界遗产的管理。

中国转型过程中，遗产的价值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意义和文化影响来衡量，还可以通过将资源转化成保存和保护遗址的能力等方面来衡量。从公众角度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遗址管理与文化旅游的结合是基于平衡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通过遗产价值的公众意识，遗产管理目标的实现可以有效地实施和实现。因此，问题应是如何平衡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尽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但如果上述价值的考量不平衡，世界遗产的管理将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我们经常批评地方政府不受控制地发展经济，特别是考虑到文化旅游会干扰文

化遗产管理的过程，但还应承认文化旅游可以增加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中的公众意识，同时也带来了保护项目中所需的财政资助。像平遥和丽江所说明的那样，如果它们没有成为世界遗产，那么它们自身曾经童话般的城市价值不会得到合理的评估。又如安徽省西递和宏村，两个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代村落面貌、古代建筑和历史传统，它们的文化价值可能仅仅只有它们自身的居民了解而已。值得注意的是，36个“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只有西递和宏村是世界遗产。显然，其他34个遗产村落民众心中不可能达到同样的高度，甚至它们的居民也不认为自己的村落可以和西递和宏村相比。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这种差异性。很多专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促进文化旅游来推动古代村落的长期保护规划的实施，并为处于财政困境的古代村落的政府筹集保护资金（Luo, 2007）。因此，文化旅游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在对遗产的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即便感受文化是文化旅游的目标，但是文化旅游仍是一种商业手段。如果商业导向的行为不受控制，如兜售假古董、价格过高的酒店和酒吧、低俗的文化表演等就会在遗址泛滥，这肯定会降低遗产的文化价值。但问题是，如果文化遗产管理在与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中处于劣势，那么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就像曲阜那样文化价值可能会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游客数量过多可能会对比较脆弱的遗址带来影响。每年数百万的游客已经对北京紫禁城的台阶和地砖造成了严重侵蚀。虽然旅游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修复某些损坏，但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重要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与世界遗产大会设立评估过程的初衷不符。

总之，文化旅游在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管理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个问题也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案例值得中国政府深思，特别是思考如何在申请世界遗产中评估和重新评估遗产的价值，以及如何对文化旅游进行管理。现有条件下评估遗产价值的基础很明显地建立在公众评估之上。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遗产对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文化遗产的公众意识无疑是需要极力推动的，特别是文化旅游业者需要推动的。

Evaluating Values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China

Shen Chen

(Royal Ontario Museum, Canada)

Evaluating values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WHS)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tou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always a challenging subject of study. There is no sufficient study in cases of China, a nation holding 35 WHS on the UNESCO list, ranking third in quantity among 141 State Parties. Overly enthusiastic desires for WHS designations, as practiced in China at present, are triggered by dramatic increases in economic prospects from

the blooming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issues of how heritage values can be evaluated and applied to events of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or how cultural value of heritag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conomic value in the event of cultural tourism for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this paper, presentations of many ca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growing cultural tourism provide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for managing WHS in China for the time being.

Examined some of current practices in managing WHS related to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mixed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re a part of progress in improving WHS management during the rapid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During such a transition, values of heritage can be measured not only by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but also by its capacity of generating resources for heritage preservations and conservations. Heritage management related to cultural touris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balancing the scale of both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of heritage sites in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who in turn will value the heritage in ways that measures of heritage managerial tasks could be supported and implemented effectively.